

生死战友情

□孙永棠(东台)

清明时节的一个清晨,缪志成和夫人开车前行在通往浙江嘉兴南湖区的高速路上。此时,他的思绪早已飞回到几十年前广西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。

那时,他由南京军区支援到广西军区边防一师某团任重机枪连卫生员,在战地一线救治伤员。

最令缪志成难忘的一次战斗是:拔除我防城县洞中公社对面越军横模镇据点。我边防部队奉命于1979年3月1日凌晨发起进攻。战斗十分激烈,缪志成记不清一共消灭了多少敌人,救治了多少伤员。最揪心的是,有些伤员躺在他怀里,包扎伤口的时候就停止了呼吸,成为烈士。其中有个人的名字,就像刻在他心里一样,终生难忘,那就是他们连三排九班班长周培德。

当时,周培德这个班负责用机枪压制敌人的火力。敌人在扔下一片尸体后哑然失声。然而,培德看到对方阵地上仍有伺机反扑的残敌身影,于是毅然决然冲了上去。这时敌人一发炮弹呼啸而来,他倒在血泊之中。此刻志成身边没有担架,他毫不犹豫地奔跑过去,背起培德就往山下跑。起初,周培德还能用双臂抱住志城的双肩,但大约三百米后却渐渐松了下来,身子往后坠了下去。志成意识到了什么,便选了一块较平的地方将他放了下来。伤者艰难地挪动右臂,用手指向左上衣口袋,不一会就闭上眼睛,青春年华定格在23岁。志成小心翼翼地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片和5元人民币。志成轻轻地打开被血粘着的纸片,发现是培德参战前写下的入党申请书。在申请书右上角还加了一句话:“我如果牺牲了,请组织追认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,算我给父母一个交待。这5元钱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的党费。”面对这沾满鲜血的申请书和发自肺腑的话语,志成顿觉心脏一阵紧缩。周培德光荣献身的事迹和生前的崇高理想,受到部队党组织的充分肯定。战后不久,他便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,并追记三等功。志成也因表现突出,不仅火线入党,同样被记三等功。

志成转业后,部队邀请转业干部到防城那良祭扫烈士墓,好多熟悉的英名都在眼前,唯独没有找到周培德烈士的墓。这无疑给志成留下了一个悬念、一桩遗憾。

在部队时,他知道培德原籍是浙江嘉兴市南湖区,现在家人情况如何,他们知道不知道墓在哪儿?志成不知打了多少电话,写了多少封信,甚至在网上发出许多帖子,均没有得到确实的回音。但他没有灰心。一天,他想到,能否请当地政府帮忙?于是他立即写了封意深情切的书信投放嘉兴市市长信箱。隔了没多久,便得到嘉兴市民政局的回信。原来周培德家住余新镇石堰村,牺牲后,家乡政府曾开过追悼会,并对家人给予优厚的抚恤。现在,其父母均已经离世,姐姐和姐夫还在。他们已将烈士遗骸迁回故里重新安葬。

余新镇到了。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墓矗立眼前。“周培德烈士之墓”七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。墓碑左上角嵌有烈士遗像,年轻英俊,帽上的红五星,衣领上的红旗无比鲜艳。志成注目烈士遗像,两行热泪滑然而下。“好兄弟,我们来看你了……”他拔去墓碑四周的杂草,然后用毛巾仔仔细细地将墓碑上的尘土一点点擦净,并献上鲜花,点燃一沓纸钱。那纸灰随风飘起,就像只白蝶在空中飞舞、飘荡。志成在墓前站立了很久很久,心情是那么沉重,而思绪却又飞得那么高远……



听烈士遗物“说话”

□贾秀全(市区)

那天,太阳快要落山了,我赶到珠溪文化研究会,瞻仰姚公铭烈士的几件遗物。

姚公铭,盐城人,世居伍佑,1924年出生,3岁丧父,14岁辍学随母避难,17岁成为新四军隐蔽战线情报员,21岁入党,这年秋在新四军发动盐城战役之伍佑战斗前夕,传递情报时不幸被捕,临刑前昂首挺胸,坚立不跪,英勇就义。

不久前,我在阅读研究烈士的相关史料后,采访20多人,撰写一篇纪实文学《公铭一绝笔》,收笔之前,我想听一听烈士遗物“说话”。遗物是姚公铭侄儿姚瑟捐赠的,他响应街道号召,是在古镇改造中把位于富民巷2号的姚宅签了搬迁协议后,经再三考虑,捐给研究会的。为什么说再三考虑呢?这些遗物本是家传之物,是在三代人接力下保管了70余年的“传家宝”。二奶奶(姚公铭母亲)临终前交给姚瑟的父亲姚定前,父亲2018年正月以91岁高龄寿终,弥留之际托付他:“这是公铭大伯在世上仅存的几件遗物了,你要好好保管,不能弄丢失。”姚瑟

含泪答应父亲:“您放心,我会传下去的。”有一天,他接到伍佑街道电话通知:古镇改造,他家的房子要搬迁。姚瑟犯难了:古镇改造,是造福百姓的好事,但大伯的遗物离开故土不是二奶奶的心愿,也不是父亲的心愿,必须周全考虑。经过深思熟虑,姚瑟决定捐给家乡珠溪文化研究会。

研究会会长卞龙林先生获赠了这袋用红布包裹的物品,小心翼翼地打开:一块“无上光荣”匾、一张遗照、一面铜盆、一只青瓷碗、一条帐帷。

“无上光荣”匾是两块杉木板拼接的,略有缝隙,隶体,铭饰。当年伍佑解放后,地方政府为姚公铭烈士举行追悼大会,追认姚公铭为中共正式党员,将烈士生前活动过的八大改称公铭乡、生前住过的街道改为公铭街,并到姚家慰问,赠给姚母丁玉良女士“无上光荣”匾。姚家人将其视为至珍。

那张遗照其实是画像。姚公铭脸庞瘦削,三七开分头,眉目清秀,挺鼻梁,嘴巴微合,对襟黑衣,一双机敏的耳朵显示着主人具有探听情报

从事隐蔽工作的禀赋。姚公铭罹难后,人头被示众三天三夜,姚家人借钱从伪军39师赎回人头、尸身,悲痛欲绝的姚母一针一线给儿子缝合遗体,用铜盆清洗头颅及其身体的血迹泥污,请画师画了一张像。铜盆现已铜绿斑斑,烈士的往事如昨。那只青瓷碗,敞口,是镇上讲究人家宴会时盛菜的“头大碗”,姚母曾用来给公铭下过生日面。碗壁上有微尘和两条闷缝,底部绘有“岸影飞禽”图。我捧在手上,掂量着,它重实、敦厚、古朴。它的主人是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者,浩气的养成也离不开五谷杂粮锅碗瓢盆的滋润。还有这条五六成新的丝绸帐帷,几十年下来依然完好,大红底绣了花鸟,图案精美,一派喜气。

遗物无声,但我似乎能听到它们的“絮语”。当年姚家也算殷实人家,姚公铭又是母亲唯一的儿子,他冒着杀头的危险,凭着理想和情怀,义无反顾地投身党的地下工作,最终壮烈牺牲。他是救亡图存、争取民族解放、舍生忘死的英雄。



消逝的“豆腐幌”

□颜良成(射阳)

乡下小弟打来电话,告诉我做豆腐的季“走”了。不由心中戚然,默默祈祷:“季,一路走好!”

我和季是发小,虽然多年不见,但季的形象依旧那样清晰:高高瘦瘦,背微驼,细脖子上挑着个不大的脑袋,前倾着,走路时上下颠簸,像极了乡村早年豆腐坊前的“豆腐幌”。季是做豆腐的,这形象还真是造物主量“事”定做。

“豆腐幌”,就是卖豆腐人家的标志。豆腐坊前竖一根高大的毛竹,顶端绑上一截可以起落的一丈余长的竹竿,竹竿上端挂着三个连环相扣的草圈,下端垂下一根长绳,人在地面拉紧长绳,竹竿就带着草环高高翘起。系好绳,三个连环草圈便在天空随风飘荡。这也就告知远近的乡邻们,豆腐出榨了,可以前来购买;松下绳子,竹竿垂下,连环草圈也耷拉下来,表明豆腐已经售罄,可别再来免跑空趟。

那时季在生产队豆腐坊做豆腐。豆腐是农家的奢侈食品,通常舍不得吃。因此,豆腐坊平时生意清淡,季显得很清闲。逢年过节是季忙碌的时候。尤其是春节,豆腐是

农家人的头道菜,“豆腐——陡富”,新年讨个吉庆。进入腊月二十后,那豆腐坊竹竿上的三连环草圈整天在寒风中高高地晃晃荡荡。

豆腐坊不仅是作坊,也是社交场所。人们白天参加集体劳动,晚上常聚集到豆腐坊谈天说地。有人嘴馋了,赊几块豆腐干,咂吧咂吧地细嚼慢咽,诱得其他人直着脖子吞口水。其时,季会拿出一本本子记个账,生产队分粮时扣除。我和季年龄相仿,初中毕业后回家参加劳动,工余时,豆腐坊便成了最好的去处。寒冬腊月,豆腐坊里暖烘烘的,不舍离开,于是干脆钻进季的被窝里,睡到第二天早晨出工。而更有诱惑力的是,夜里能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豆浆,吃上两块刚出榨的豆腐干,那鲜美的口感和味蕾的享受,简直无与伦比,至今想起仍口齿留香。

其实,做豆腐是非常辛苦的活计。但季做的豆腐远近闻名,不仅白嫩清香,而且软硬适中。要做好豆腐,点卤是关键。季点卤的技术简直炉火纯青。他蹲下身,弯着腰,一手端着盛着卤水的黑瓷碗,碗口上横放着一根竹筷,轻轻地将碗

倾斜,卤水便顺着竹筷均匀地流入已经煮沸的豆浆里;另一只手握着大勺,轻轻地搅动洁白细腻、热气腾腾的豆浆,随着豆浆上下翻滚,慢慢地魔术般发生奇妙的变化,稀薄的豆浆渐渐地黏稠,又凝结成晶莹剔透的团状,这就是白花花、粉嫩嫩的豆腐脑。直到豆腐脑和泔水完全离泄,泾渭分明。他边点卤边观察豆浆的变化,那专注的神情就像一个科学家在做极其重要的科学实验。卤水点完了,季站起身,点燃一支烟,两眼依然盯着豆腐脑,那神情仿佛在欣赏自己的得意作品。他说,点卤完全凭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感觉,多一滴则老,少一滴则嫩。直到泔水从木屉中哗哗流出,他的脸上才漾出笑容,走出豆腐坊,升起了挂着三个草环的豆腐幌。

后来,实行分田到户,生产队散了,豆腐坊还在,那是季花钱买下的。连续几年,豆腐幌每天早晨都像与太阳约定好一般同时升起,昂首挺立,摇曳生姿。随着季年岁渐高,体力不支,终于有一天豆腐幌不再挺立,竹竿也随之消失。如今卖豆腐也不再用豆腐幌了。

